标准不尽相同 差距可变潜力

判断城市“有没有前途”需谨慎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最近，一场关于“中国最没前途的十大城市”的讨论明显升温。在讨论中，有观察者以“是否有三条以上高铁通过”“人口是否流入”“人均本外币存款”“教育资源丰富程度”等指标为依据，将长春、大连、南昌、温州、兰州等多个城市纳入“最没前途”之列。对此，不少专家指出，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原有区域发展不均衡确实会有新的表现，但仅仅以几个简单指标就断定一个城市或地区没有前途，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很多所谓“失落”的城市都有着独特优势，而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格局也必将为“将差距变为潜力”提供根本环境。

评价结果辩证看待

众所周知，考试是检验学习者掌握某方面知识水平的一种直观方式。但如果因为考生在某些考试中成绩不佳，就给予一个“没前途”的结论，则显然并不可取。毕竟，人和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魏后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评价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维度，标准不一样，结果可能就大相径庭。因此，研究者在指标选取和权重分布上就要讲求科学性。“即使是相对严谨的评价体系，其提供的评价结果也只能说是一个参考，并不代表一定完全等同于实际情况。事实上，人口流动、高铁布局、教育资源等几个指标只能反映出一部分情况，其衍生出的结论并不全面。”魏后凯说。

那么，所谓“没前途”的城市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记者梳理发现，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点城市而言，不被看好的城市大多面临交通不便、人口净流出、经济转型压力较大、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等问题。其中，有些属于历史原因，有些则属于经济转型带来的新问题。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肇勇在分析长春的发展时认为，东北是计划经济退出最晚的地区，国有企业、国有渔场、国有林场等单位的职工都属于非农户籍，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到位的，而这是导致如今人口出生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占比高也导致民营经济生存的空间比较小，当国有单位不能承载更多的就业时就容易形成劳动力外流。

发展优势各有千秋

差距往往就是潜力，悲观难以解决问题。在不少专家学者眼中，很多“没前途”的城市其实有着很多独特的发展优势，如工业基础雄厚、毗邻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国家战略支持等等，可谓各有千秋。实际上，不少城市和地区也正在积极调动这些优势并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势头。

例如，1—8月份，大连市高技术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1.1亿元，同比增长12.7%，增幅比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9.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正在成为拉动这座港口城市工业增长的强大动力。再例如，地处中部内陆的南昌市近年来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修建地铁、隧道、桥梁等工程夯实“南昌大都市区”的基础，进一步打通和周边城市联系，以期最终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著名侨乡的浙江温州，也在此次被唱衰的城市之列。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在分析“温州人圈子封闭制约当地发展”这一观点时表示，过去温州人圈子相对封闭，大多是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的交流，从事着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商贸往来。后来，温商开始涌向全国各地的市场，体现了温州人善于经商、敢于创新的特质。如今，温州人的脚步已遍及全球，温州的商品也卖向全球，同时温商也将全球的优质资源逐渐反哺到温州。张一力说，新生代的温商具备了华侨基础、海外资源、全球视野等特质，他们更聚焦互联网、金融、服务、节能环保等新兴领域，这些都有助于温州的发展。

“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并不是最重要的，城乡之间的差距、特大型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值得关注。”魏后凯强调，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培育和挖掘各地方经济的活力，使各地的优势尽可能地释放。

扎实改革释放潜能

经济转型时期，尽管一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会更突出，但对更多城市而言，机遇明显大于挑战。

分析人士表示，城市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因为制造业需要在能源、交通、通信各种资源都集中的地方开展。但同时更应看到，随着全球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城市继续成为产业中心的可能性正在减小；反之，环境好、资源又丰富的中小城市会成为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因此，相比于轻易判断一个城市“有没有前途”，认清相关地区的优势和不足、扎扎实实以改革促发展，显然有着更加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旦我们真正地找准了发展方向，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大量成熟的技术工人、深厚的原材料资源、科研院所云集等等优势，就都会成为长春的希望所在。”丁肇勇认为，现在不是埋怨和指责的时候，也不适合散发悲观情绪，而是要更积极主动、齐心协力找出问题成因，提出解决对策。

专家建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应采取多方面措施，既要练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硬功”，又要注重打造软环境的吸引力。“对城市管理者来说，首先，要加强创新并依靠创新打造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产业集群；其次，要认清城市发展缓慢背后所反映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不到位问题，加强二者对产业和企业的支撑；最后，要格外重视对居住、营商等社会环境的改善，破除制约人才吸引力的体制机制障碍。”魏后凯强调。

热点聚焦

统计局三季度数据显示

中国文化产业上升趋势明显

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邱海峰**）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数据。据统计局对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4.9万家企业的调查，前三季度，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0%（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素），增速尽管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但依然保持较快增长。

据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文化及相关产业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文化服务业快速增长。其中，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的4个行业分别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3917亿元，增长30.8%；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878亿元，增长20.1%；文化艺术服务业203亿元，增长17.7%；广播电影电视服务业1081亿元，增长13.6%。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2001亿元，占全国比重为75.2%，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9176亿元、3994亿元和711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6.4%、7.1%和1.3%。

中国人民大学近日发布的“2016中国文化产业指数”也显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正保持上升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彭翊指出，结合2010年到2016年指数的变化趋势，从整体态势来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基本呈现正增长的态势，年平均增速达到1.08%，体现文化产业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中逆势上扬的特征。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16年财政部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模式作出重大调整，即：加快由无偿向有偿、由直接分配向间接分配转变，努力实现市场化配置目标。一方面，完善财政参股基金出资模式，适当扩大参股基金范围，安排10亿元参股全国14只优秀文化产业基金，直接撬动其他各类资本120亿元；另一方面，聚焦“双创”融资难题，首次探索开展债权投资扶持计划，形成财政出资引导、文投集团配套跟进的全新投入机制。其中，中央财政出资5.6亿元、带动配套46.8亿元，为破解长期困扰文化企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指出

中国债务：风险可控，挑战仍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申铖、韩洁**）针对外界关注的中国债务问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31日表示，中国的债务水平公开透明，总体风险可控但挑战仍存，需要警惕企业债务增长过快等问题。

针对中国债务率是否过高的问题，朱光耀表示，外界所讨论IMF公布的220.40%债务率，是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家庭和企业债务等各类债务。单从政府债务来看，无论IMF还是NFID公布的数据都显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的债务率均不超过40%，这其中还包括了部分从地方融资平台转化过来的债务，总体比例是合理的。

民航局鼓励社会资本建机场

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赵展慧**）民航局日前印发《关于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运营民用机场的意见》，全面放开民用机场建设和运营市场，创新民用机场建设和运营投融资方式，加大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政策支持，以提升机场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民航行业安全、高效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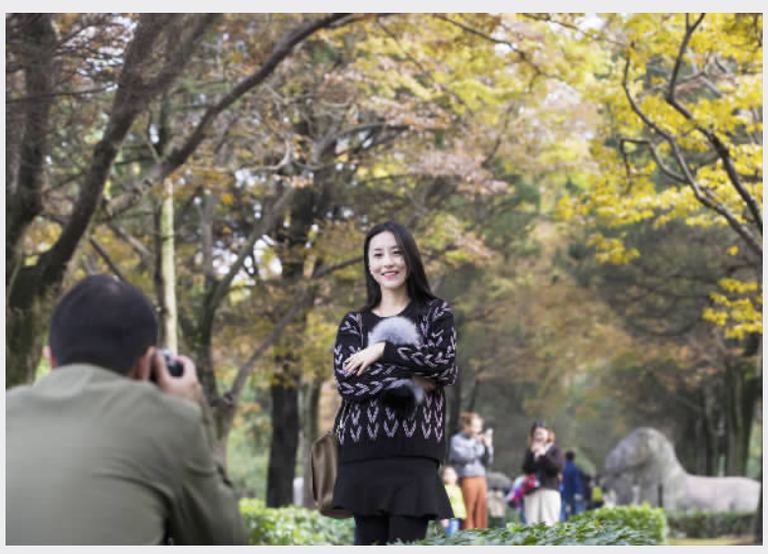
根据《意见》，民航局将把符合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国家批准的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以及行业发展规划的运输机场项目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同时全面放开通用机场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投资限制。未来，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国有、民营、外商投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其他投资经营主体，可单独或组成项目联合体全面参与民用机场咨询、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业务。

华夏幸福PPP探索获认可

本报北京电（**王俊岭**）今年以来，我国各界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探索中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一大批优质项目得以敲定。其中，一些成功案例颇具示范意义。

例如，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河北省固安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和“南京市溧水区产业新城项目”就获得了高度认可。这些项目实行“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市场化管理模式，政府部门通过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及要素价格干预，清晰界定与企业的权责边界，从而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华夏幸福则承担产业新城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园区融资、产业招商服务、市政运营等工作。如此一来，政企双方用“契约精神”取代了“身份观念”，从“一事一议”变为以PPP机制为核心的协商制度，既减少了操作成本，又大大提高了城市建设与公共服务效率。

南京明孝陵秋意浓



深秋时节，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南京明孝陵景区石像路秋意犹浓，迷人的秋色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图为游人在景区拍照留念。

苏 阳摄（**人民视觉**）

中国第四次高票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罗艳华

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系统中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016年10月2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了理事会成员国选举，中国以180票获得连任。这是中国第四次以高票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2006年3月15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经过表决，在绝大多数国家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设立人权理事会，取代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属的人权委员会。中国在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磋商和最后表决过程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此间中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主张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后，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5月9日，第60届联大选举人权理事会首届成员时，中国以146票成功当选，任期自2006年至2009年。2009年5月12日，在第63届联大改选18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时，中国又以167票成功连任，任期自2009年至2012年。

根据相关规定，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3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这意味着中国在连任两届后不得立即再选。2013年11月12日，第68届联大在美国纽约当地时间举行全体会议，投票改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在此次选举中以176票再次当选，任期自2014年至2016年。今年的10月28日，中国再次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选举，第四次以高票当选连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四次当选的票数从146票、167票、176票，到今年的180票，得票可谓是屡创新高。中国此次获得的180票在亚太组候选国家中得票最高，也是全场第二高票。

中国四次高票当选背后还是说明很多问题的。在2005年酝酿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过程中，按照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建议，人权理事会成员由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直接选举产生。但2006年3月15日表决通过的设立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规定人权理事会成员由联大直接投票产生，须得到半数以上联大成员国的支持。这实际上降低了国家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的难度。但中国四次当选的票数都大大超过了联大三分之二的多数。这说明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实际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高度认可。同时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之前三次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期间履职表现的赞许。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认真履行职责，以积极的态度参加理事会的各项活动，很好地发挥了一个理事会成员国应该发挥的作用。此外，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保护人权实践的肯定。按照相关规定，在选举理事会成员时，联大应考虑候选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所作的贡献。所以中国此次再次高票当选也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主张和中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同时，这也是中国继续参与国际人权事务，为国际人权事业贡献中国智慧的新契机。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人权进步的中国被世界寄予厚望

柳华文

10月28日，联合国传来消息，中国再次高票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第二次获得连任。

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是联合国全面负责人权事务的最重要的机构，由47个通过联合国大会选举的成员国组成。在联合国提出和平、发展和人权为其改革和发展的三大支柱，不断倡导“人权主流化”的大背景下，人权理事会的工作既是联合国人权机制的重心所在，也在联合国内外不断产生深入和广泛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备受瞩目。因此，中国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多次以高票当选，而且是再次获得连任，换句话说，在程序规则提供的所有机会中，中国均能顺利通过选举，获得高票推选，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在人权对外交往中的一个亮点。

拥有中华文明的中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体现在人权领域就是人权自信。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显著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中国从来都没有简单、孤立地谈人权。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中，将人权与和平联系起来，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同时，中国将人权与发展也密切结合在一起，历来主张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和主张是发展中国家的心声，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人权理论和制度的贡献。

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将让所有贫困人口脱贫。而且，中国坚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导下来实现发展目标，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当今世界对证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面对着南北发展失衡的现实。基于此，中国支持联合国通过和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在从今年开始的15年内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今年9月，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G20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中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紧扣和平和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在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中保障人权，中国是国际法治和世界秩序的正能量。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正在积极实施第三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更加精彩可期。在联合国，更加自信的中国，仍会以人权理事会为平台，恪守人权理事会客观、透明、建设性、非选择性、非对抗性、非政治化的工作原则，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